

政治學比較方法的類型和運用

摘要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控制比較方法、脈絡化比較方法和多重個案比較方法的效用和選擇標準。控制比較方法基本上是藉由個案之間的類似和差異的控制來搜尋因果之間的關係和連結。脈絡化比較方法則是處理控制比較方法無法處理的比較個案，透過選擇分析上平行的現象來進行比較。多重個案比較方法則是比較兩個以上的個案，藉由類型分析或組合排序來進行比較。本文主張多重個案的選擇標準應該根據下面的標準：一、先演繹、後歸納；二、具有可比較性；三、因果同質性；四、比較正面和反面的個案；五、否證性；六、資料的對稱性。

關鍵字：控制比較方法、脈絡化比較方法、多重個案比較方法、類型建構、組合排序

政治學比較方法的類型和運用

壹、前言

著名的比較政治方法論學者 Sartori (1991: 245) 曾經提到，如果研究者只認識一個國家時，實際上等於這個研究者不認識任何的國家。因為研究者無法知道一個國家的獨特性，也無法確認一個國家所得出的因果關係是不是可以成為一般化的因果關係進而適用於其他類似的個案之中。因此，比較方法的運用屬於一種控制，讓從事比較跨國系統的研究者，可以學習其他個案的經驗 (Sartori, 1994: 16)。在進行比較的過程中，如果其他的個案也具有相同的原因，但是卻沒有出現相同的結果時，事實上可能存在之另外的原因也會影響結果的差異 (Lim, 2016: 46)。換言之，藉由比較相關原因造成最後結果的正面個案 (positive cases) 和出現相關原因卻沒有造成最後結果的反面個案 (negative cases)，才能確認因果關係的連結性 (Mahoney and Goertz, 2004)。個案除了與其他個案進行比較之外，也可以透過個案內部來形成比較的控制基礎。研究個案時，可以透過個案內比較 (within-case comparisons) 方法來確認因果關係，將研究的單位分成兩個不同的時期，前面的時期沒有出現解釋的原因和被解釋的結果，後面的時期出現解釋的原因和被解釋的結果，同時控制兩個時期的其他變數來進行比較 (Lim, 2016: 53)。結合來看，透過研究個案內部與研究個案外部的雙重比較，可以驗證因果關係的成立與否。因之，不管是單一個案或多重個案的比較研究，都應強調系統性的驗證方式，透過對比來證成因果關係的連結。換言之，任何的研究基本上必須透過比較才能掌握特定個案的特殊之處以及其中的因果機制。使用比較方法的目的是在於測試一般化命題以及評估具體或特殊現象詮釋的有效性 (Hopkin, 2010: 289-290)。假如一個命題可以是適用於一個個案的話，則這個命題也可以適用到其他的個案上，因此個案研究的結果可以成為理論的測試 (Peters, 1998: 3)。比較研究可以增加個案研究的嚴謹度 (rigorousness)，同時個案研究也可以成為比較研究測試理論和途徑的切片 (tranche) (Lees, 2006: 1098)。亦即，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經由比較可以延伸單一個案的通則性以及確認特殊現象的因果關係之外擴性。

然而，理論一般性和個案解釋的正確性會出現緊張關係，研究者希望其研究的結果能夠適用到其他的個案而具有理論一般性，但同時也期待不要扭曲其研究個案之獨特性 (Caporaso, 2000: 699)。因為增加觀察的個案數目可以提升一般化的層次，然而提升一般化的層次會有讓原本的個案失去脈絡化知識的風險或是可能面臨個案和個案之間在分析上不能等同的問題 (Brady, Collier and Seawright, 2010: 19, 24)。¹換言之，比較個案研究所得出的理論適用有其侷限性，不能過度宣稱其一般化程度，亦即個案特徵或是個案所得出的因果關係不能簡化成所有的類似個案都會出現一樣的結果，因為其他類似個案可能會有其他的脈絡化因素

¹ 有關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的研究設計和哲學基礎的辯論可以參閱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的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和 Brady and Collier (2010) 的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兩本書。

會影響結果的發生。兩個或多個以上的個案必須具有可比性（comparability）才能進行比較。所謂的可比性是指比較兩個個案之間類似的特性和特徵，例如梨子和蘋果是可以比較的，因為兩個都是可以吃的水果，都生長在樹上，雖然他們的形狀是不同的；換言之，個案的可比性必須屬於同一類別下具有相類似的特性（Sartori, 1994: 16-7）。²可比較是代表兩個東西是相似的，一方面針對相似性進行比較，另一方面也可以針對差異性進行比較（DeFelice, 1980: 123）。首先，有三種研究策略可以具體執行可比較性。第一、比較類似的個案：比較具有相同的特徵或在相同區域的國家，是不是出現相同的因果關係（Dogan and Pelassy, 1990: 133）。第二、對比個案的比較：比較個案明顯對立的特徵，如穩定和不穩定、向心或離心、兩黨或多黨、英美或歐陸國家的差別（Dogan and Pelassy, 1990: 144）。對比個案的研究也可以將多重個案分成兩組，來比較兩組個案之間的因果關係或過程發展中的差異（Collier, 1993: 112）。第三，將許多個案類似的重要特定（變數）當成常數，而把個案中差異的特性連結一起來進行解釋和分析（Lijphart, 1971: 687）。這種比較方法強調擴大自變數的變異性、讓控制變數的變異性很小以及不要根據依變數來進行比較（Lijphart, 1975: 164）。這三種比較策略分別強調個案之間的類似性、差異程度和差異性。其次，個案的比較研究有三個先決條件：一、必須以一般性的變數來描述和解釋，而不是將個案所有的特徵加以呈現、二、必須確認研究的事件或現象是屬於所要發展理論的哪一個類別之個案、三、必須界定所描述和解釋個案的哪些面向是研究者的理論興趣或實用的關懷（George, 1979: 50）。再者，控制比較可以建構不同的類型，企圖解釋類似的個案為何會產生不同的依變數結果或是個案有相同的結果，但卻出現不同的解釋，其主要的目標是找出不同種類的因果模式以及造成因果模式的條件為何，而不是解釋結果發生的可能次數或發生頻率（George, 1979: 59-60）。比較方法強調總體因果的分析、理論的對比、脈絡的對比等重要面向（Skocpol and Somers, 1980: 175）。整體而言，比較研究主要是側重理論指引、變數解釋、控制設計和類型建構的研究方法。

政治學研究運用比較方法可能會產生的難題和因應之道。首先、比較方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變數太多、個案太少（Lijphart, 1971: 685）。變數太多、個案太少的問題可以經由增加個案數目、集中在可比較的個案³以及減少變數的數目來解決（Collier, 1997: 39-42）。第二、比較方法的研究會關注有產生依變數結果的個案，這樣容易造成選擇性的偏差。解釋個案中自變數和依變數的因果關係是否成立必須同時檢證相同條件的個案中自變數是不是與依變數同時共變，如果其他相同條件的個案中，自變數的值是高的時候，卻沒有出現同樣依變數的值也是高的話，則這個自變數和依變數之間可能沒有關係或是無法形成一般化現象

² 在生物學界，通常以界門綱目科屬種來建構類別的大小。本文認為政治學的研究同樣地也必須透過類別和類型的建構，才能達成分析和解釋的效度。

³ 所謂可比較的個案是指根據分析上的必要來選擇個案，而不是根據個案地理的近似性，因此研究上會出現跨區域的比較研究，相關的討論請參閱 Collier（1997：41）。

(Geddes, 1990: 132-133)。換言之，部分個案的因果關係效度無法適用到更大的母體之中，甚至可能因果關係只存在少數個案之間。然而，當因果關係的一般化程度擴大時，會出現所有個案皆等同化的現象。一般化程度越高，越可能犧牲個案的脈絡化特徵或是忽視不同類別的差異性。包含更多個案的研究可以進行更廣泛的比較，但是同時也會出現包含更多異質性的因果關係 (heterogenous causal relations) 的利弊得失 (trade-offs) 問題 (Collier and Mahoney, 1996: 68)。擴大選擇個案的理由不是為了結合更多的個案，而是選擇一些研究者所感興趣的變數組合之個案 (DeFelice, 1986: 422)。另外，不同類別的個案雖然都出現依變數的結果時，其自變數不必然都是一樣或是有一些自變數一樣，其他的自變數可能不同。當比較更多的個案所出現的因果異質性之問題，不是由於個案選擇的偏差，而是存在著不同的因果模式 (Collier and Mahoney, 1996: 82)。因果路徑的多重性而不是單一性才能解釋和分析複雜多元的政治或社會現象。最後，比較正面個案 (positive cases) 和反面個案 (negative cases) 可以解決選擇性偏差的問題。所謂的正面個案是指有發生依變數結果的個案。反面個案是指有可能會出現依變數結果的個案，但最後卻沒有出現 (Mahoney and Goertz, 2004)。正面和反面個案的比較可以控制特定的因果條件和檢證因果關係的解釋效度。

廣義的比較方法包含統計 (statistics)、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s) 和分析敘述 (narratives) (Laitin, 2002: 630)。本文主要側重分析敘述類別下的質化方法。質化方法的理論發展會運用三種不同的策略：一、觀察結果與理論預測不一致的異例 (deviant case) 來形成新的假設；二、運用並列個案多重特徵的比較方法來形成新的假設；三、收集時間歷程的資料和關注長期過程來形成新的假設 (Mahoney, 2007: 125-126)。第二種策略的比較方法又可以細分成三種基本的類型。第一種是控制比較方法，如 Mill (1843/2000) 的一致法和差異法或是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的最相似比較法和最相異比較法。第二種是脈絡化比較方法，這種比較方法主要是透過脈絡化層次的提昇，將一些看似不能比較的個案，也可以進行比較分析 (Locke and Thelen, 1995; 1998)。第三種是所謂的多重個案比較方法，以兩個以上的個案或是多重個案來進行比較。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控制比較方法、脈絡化比較方法和多重個案比較方法的效用和選擇標準。

貳、比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

一、同一和差異的比較方法

英國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提出控制比較方法作為科學研究的基礎。Mill (1843/2000) 在其著名的著作中—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1843)，提出有名的五種實驗調查方法：同一法則 (Method of Agreement)、差異法則 (Method of Difference)、聯合使用同一和差異法則 (Joint Method of Agreement and Difference)、剩餘法則 (Method of Residues)、伴隨性變化法則 (Method of Concomitant Variation)。以下集中焦點在討論 Mill 的兩個

控制的比較方法：同一法則和差異法則。第一、同一法則(Method of Agreement)：假如在調查中的兩個或是更多現象的個案中之所有例子中，僅僅只有一個條件一樣，則這個條件是一個特定現象的原因或影響；舉個例子來說，當 ABC 三個條件一起出現時，則會出現 abc 的結果，且當 ADE 三個條件一起出現時，則會出現 ade 的結果；因此研究者可以推論 b、c 不是 A 的結果，因為他們並沒有在第二個例子中出現；同樣地，d、e 也不是 A 的結果，因為它們並沒有在第一個例子中出現；現象 a 也不是 B 或是 C 的結果或是 D 和 E 的結果；因之，可以推論出現象 a 是條件 A 的結果 (Mill, 1843/2000: 388-90)。舉例來說，日本和美國憲政體制、政黨發展、政治運作模式皆不同，但是美國和日本同樣使用單一選區的制度來進行國會議員的選舉，單一選區之選舉制度的牽引會形成兩大黨的政黨體系 (Duverger, 1969: 217)。差異的特徵成為控制的變數，因為兩個國家的差異特徵是不同的，但卻都出現了相同的結果如兩黨體系，因此這些差異原因並不是影響結果的解釋原因，而兩個國家皆存在的相同原因才是造成結果的驅動力。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139) 稱此一法則為最相異比較法。Przeworski and Teune 兩位學者的最相異比較法強調個案的條件或是特徵的差異，而 Mill 同一法則主要是強調兩個個案中相同因果關係的連結。雖然兩者名稱不同，但是指涉相同的方法內容。同一法則或是最相異比較法具有三種優點：在廣泛的個案群體中，關注類似或是相同的過程可以擴張或是限制已經建立之研究發現的範圍條件；檢驗研究母體的外層個案 (outlier) 可以找出關鍵的原因變數；可以找出與過去個案分析所得出來的原則相異之處 (Tarrow, 2010: 235)。同一法則或是最相異法則可以說是科學發現的起始步驟，也是控制比較方法中重要的辨識工具。

第二、差異法則 (Method of Difference)：假如一個例子產生了所要調查的對象，另外一個例子沒有產生該現象，而在兩個例子之中，每一個條件都相同，除了一個條件不同，這個條件只發生在前者，這兩個例子所不同的條件即是該現象的原因，或是原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舉例來說，當 ABC 的結果是 abc 和 BC 的結果是 bc，則明顯地 A 的結果是 a；亦即可能是 A，也可能是 A 伴隨著其他呈現的條件成為原因 (Mill, 1843/2000:391)。差異法則是去比較一個發生結果的個案和一個沒有發生結果的個案之間存在的原因是否有差異；個案中特定原因的存在與否會造成結果出現與否的差異。舉例來說，台灣和韓國基本上都是出口導向經濟、儒家文化、新興民主國家，然而兩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不同的，韓國以大企業為主，而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韓國受到的衝擊較大，而台灣所受到的波及相對較小。換言之，企業結構的差異可以解釋國家承受危機的能力之不同。研究的依變數必須要有差異的程度，否則無法適用差異法則。比較方法學者 Lim (2006: 39) 指出，過去國家發展理論皆以南韓和台灣以相同的日本殖民經驗、威權政治系統、缺乏政治資源、與美國有緊密的政經連結、儒家傳統、高度發展的教育和技能的勞工市場、出口導向的經濟等相似的原因作為控制條件，以此來解釋台灣和南韓兩個發展國家模式造成經濟高比率的成長，這樣的自變數原因和依變數結果並沒有產生變異，無法解釋兩個國家

經濟高比率成長的原因。換言之，兩個國家之所以經濟高比率的成長的結果必須透過對於其他類似國家的比較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舉例來說，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奠基於勞工運動的壓制，而其他類似條件的國家因為政府沒有鎮壓勞工或是吸納勞工勢力，導致外資不願投資，使得經濟無法快速成長。透過外部反面個案的比較，研究者才可能知道這兩個發展型國家經濟高度成長的真正原因，單純從內部的比較，並沒有變異性，無法篩選出真正的解釋原因。

(二)、控制比較方法的批評與回應

同一法則可能會面臨幾種限制或困境。第一、同一法則或是最相異比較法可能面對的限制在於無法控制差異的條件，因為兩個國家之間的差異很多，無法完全列舉，只能找出兩個國家相同的原因和相同的結果。第二、同一法則無法真正建立原因和結果的必要連結，因為可能有其他不明的第三因素同時影響原因和結果 (Ragin, 1987: 37)。第三、兩個相同結果的個案中如果一個原因有出現，另一個沒出現，則根據同一法則，這個原因會被排除，如果以多重原因的因果情境下，同一法則會導致不正確的結論 (Ragin, 1987: 37-8)。對於多重原因邏輯結構下，這個被排除的原因是一個充分原因，在特定的個案中結合其他必要原因或是充分原因還是會造成最後的結果。政治學或社會科學的現象都是屬於多重原因性，很少是單一原因造成單一結果。質言之，同一法則基本上只是一種篩選法則，找出相同的必要原因之後，再結合其他可能的充分原因結合一起分析才能掌握個案的完整輪廓。

差異法則的推論邏輯在於一個個案出現原因 A 和結果 O，另一個個案卻沒有出現原因 A 和結果 O，用反面的推論方式來證成原因 A 和結果 O 的關係。差異法則可能面臨以下的限制。如果第一個個案中出現原因 A 和結果 O，第二個個案中出現原因 B 和結果 O；根據差異法則，第二個個案因為沒有出現原因 A，結果 O 還是會出現，因此原因 A 會被排除，同理可證，第一個個案沒有出現原因 B，但卻出現結果 O，所以原因 B 也會被排除 (Ragin, 1987: 40)。⁴雖然差異法會出現特定的侷限，但其還是可以扮演所謂篩選性法則的功能，將重要的原因挑選出來。同時，差異法則也是一種否證 (falsification) 的方法，可以用來排除不相關的系統變數 (Faure, 1994: 315)。Mill 的法則是用來排除不相容的因果關係，而不是用來作為發現的邏輯或是原則的證明 (Savolainen, 1994: 1218)。換言之，差異法則的運用只是研究的初步階段，必須透過更多的過程分析來檢證因果推論的效度。Mill 的方法可以確認出一些背景條件和結果之間的關係，而研究者根基於這樣脈絡，提出原因到結果中間過程的中介變數作為解釋變數或是研究者認為影響原因和結果發生的因果機制為何。⁵政治學者或社會科學學者的職志

⁴ Ragin (1987: 40) 舉快速商業化原因造成農民反叛結果以及土地飢荒原因造成農民反叛結果兩種不同的個案來說明差異法的限制。本文這裡選擇用英文字母來說明差異法的可能限制，其推論的基礎是一樣的。

⁵ 一致法和差異法的缺點在於一般性的限制，因為這兩種方法會系統性地包含或排除一些個案，相關的討論請參閱 Frensdreis (1983: 266)。

之一在於提出因果機制的解釋。什麼機制會驅動原因，因而產生結果才是研究者需要觀察的過程。換言之，不能將 Mill 的排除法則當成最終機制，誤解了科學發現的程序或步驟。Mill 的法則可以幫助研究者找出重要的因果關係是否存在於相同或是不同的個案，以此作為研究設計的起點，進一步透過理論或是研究途徑的觀察面向得出重要的政治學的解釋或知識。Meckstroth (1975: 134) 指出理論的相關性可以限制控制變數的數目以及避免過度決定的問題。透過理論的過濾，讓背景的變數或條件可以達到控制的目的。質言之，理論的指引可以讓條件的變數不會無限延伸，讓研究者可以只集中焦點在幾個重要的關鍵變數，而不會有變數太多的問題。

控制比較方法主要的目的在於解釋特定依變數的出現和分析造成依變數的原因。⁶然而，政治方法論學者 Geddes (2003) 認為從母體代表性的角度出發，不能選擇無法代表母體多數的特定依變數來進行相關的研究，否則會產生偏誤，因為母體的特性可能與特定個案的特性南轅北轍。支持質化研究可以選擇依變數的學者則認為質化研究並不是隨機式地選擇任何會出現依變數結果的個案來進行研究。質化研究者建議策略性的選擇，研究具有代表性個案之間的變異，可以成為避免選擇性偏誤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Slater and Ziblatt, 2013)。所謂的代表性個案是指研究的個案足以代表母體中多數的個案。這種代表性也是所謂的外在效度，其可以經由擴張比較其他類似結果的個案來驗證其因果推論的正確性。選擇依變數不必然會造成選擇性的偏誤，最重要的還是研究者不可以侷限在特定的國家或研究脈絡，完全沉浸在特定個案的因果解釋上，其必須說明是否這個解釋可以適用在其他類似的個案上，藉此來擴大一般化的適用基礎。

控制比較的研究是屬於小樣本 (small-N) 的研究。所謂小樣本的研究是指比較一些特定的個案。這樣的比較會產生變數太多以及樣本太少的問題 (Lijphart, 1971: 685)。在特定的個案中，影響結果發生的變數很多，如果沒有透過理論的指引，研究者很難確認那些原因是重要的或是很難去評估競爭性的假設觀點。樣本太少的問題主要是指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只能涵蓋所比較的幾個個案，無法推估到其他的個案。改善變數太多及樣本太少的策略是：一、盡可能地增加個案的數目；二、結合兩個類似變數成為一個變數來減少個案的特性空間；三、集中在可以比較的個案 (comparable cases)；四、將比較分析的焦點集中在重要的變數上 (Lijphart, 1971: 686-91)。盡可能地增加個案數目的策略基本上會產生一些利弊得失 (tradeoffs)。因為增加更多的個案進行比較可能會讓個案之間異質性增加，讓一些根本無法比較的個案被放在一起比較或是形成所謂雞兔同籠的問題。如果研究者增加了一些可比較的個案，基本上可以增加研究結論的一般性和推論效度。換言之，研究者不是為了增加個案而增加個案，而是透過控制的方法，選擇一些可比較的個案進行研究。

⁶ 有關控制比較方法應用研究之中文文獻，可以參閱何明修 (2003)、吳玉山 (2002)、林正義 (2007)、湯京平、呂嘉泓 (2002)。

二、脈絡化比較方法

控制比較主要集中在不同個案中相同的自變數和依變數的關係（一致法）或是不同個案中自變數和依變數存在與否的比較（差異法）。這樣的方法基本上假定研究者觀察的自變數在不同的國家脈絡中是等同的。然而，自變數即使概念相同，在不同國家脈絡中所顯示的意涵也可能是不相同的。有時候研究者認為比較相似和相似的個案（like with like），如同是比較蘋果和蘋果，事實上相同的議題在不同的國家的脈絡是不同的；研究者應該比較蘋果和橘子，將不同國家看似不同的過程在分析上將其等同化，來解釋其中的因果連結（Locke and Thelen, 1998）。例如，每個國家勞工運動所爭取的核心議題是不同的，有些國家的勞工運動關注工時，有些國家的勞工運動關注工資的高低，另外一些國家的勞工運動則關注勞動條件，如果研究者以工時的長短來進行比較的話，形式上研究者認為是比較蘋果和蘋果，事實上可能在比較無法比較的東西，因為工時或工資或勞動條件對於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意涵是不同的，並不是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都爭取相同的運動訴求；在方法的選擇上研究者應該對於屬於分析上平行的現象，進行脈絡化的比較（Locke and Thelen, 1995）。換言之，研究者應該比較不同國家勞工運動的成功與失敗，而不把焦點集中在不同國家的相同議題上。觀察不同國家脈絡化的過程中，可以用控制比較方法來進行比較。運用同一法則看看勞工運動成功的國家是不是有相同的原因或是運用差異法則去分析為何有些勞工運動是成功的，有些卻是失敗的，比較成功和失敗經驗之中是否存在著原因本質上差異或是原因的程度差異。

脈絡化比較不僅可以觀察單一原因或是變數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其也可以透過雙變數形成的矩陣來解釋不同國家的結果。Collier and Collier（2002）以社會經濟的差異程度如社會同質性高和現代化程度高對比上社會同質性低和現代化程度低的縱向指標，對應上國家吸納勞工運動或是政黨吸納勞工運動的橫向指標，來解釋拉丁美洲八個國家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和墨西哥勞工運動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比較方法可以透過歷史的縱深比較不同國家勞工運動發展所經歷的過程。當然這樣的比較方法如同兩位作者所承認，其會產生忽略掉每個個案中獨特特徵的問題（Collier and Collier, 2002: 13）。然而，脈絡化的比較方法有三個優點：第一、讓每個個案的原因可以與其他國家結合或是對比，而不是選擇分析個別國家獨特或是專門的原因；第二、脈絡化比較可以找出個案相同因果關係或不同因果關係的理性基礎，同時可以否證其他可能潛在的解釋；第三、脈絡化比較可以觀察歷史的動態過程，屬於縱切面的深度分析，而不是橫切面的片段剪接。

Pierson（2003：179）以自然現象的四種不同事件來說明研究可能形成的類型：一、時間範圍較短的原因造成時間較短的結果如龍捲風現象；二、時間範圍較短的原因造成時間較長的結果如彗星和滅絕現象；三、時間範圍較長的原因造成時間範圍較短的現象如地震現象；四、時間範圍較長的原因造成時間範圍較長的現象如全球暖化現象。脈絡化的比較都可能涵蓋這些研究類型，主要的差異在

於研究者選定的主題和現象的不同。反面來看，特定的政治現象或事件如暖化現象，需要透過時序較長的脈絡化分析才能找出其因果關係。例如，Yashar (1997) 以脈絡化的比較方法分析中美洲國家哥斯大黎加和瓜地馬拉兩個國家在 1940 年代初期都是左派政權執政，但最後哥斯大黎加在 1950 年代是維繫民主運作，而瓜地馬拉在 1950 年代仍是威權統治，主要的原因是哥斯大黎加的左派政權的部分菁英勢力結合大眾部門的中間勢力推動漸進改革，讓民主可以展開和續行，瓜地馬拉則是左派政權的菁英團結一致，並沒有分裂，選擇鎮壓右派的寡頭勢力，導致威權體制的深化和鞏固。Yashar 的分析焦點在於不同的政治聯盟的組合會維繫或是破壞民主的建立，並以所謂的差異比較法和過程追蹤，分析同樣具有相同威權起源的國家為何最終會導致不同的政權運作結果。

比較政治學者 Laitin (1999) 以比較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和巴斯克省的獨立運動來解釋為何有些民族運動在策略和結果上都是以和平的方式結束，而有些民族運動最後卻都以屠殺的結局收場，Laitin 發現巴斯克省的地方組織較為分裂，而加泰隆尼亞省的地方組織較為統一、學習加泰隆尼亞語言比巴斯克語言簡單，而巴斯克分離運動組織的策略是透過恐怖主義來扭轉巴斯克省的少數支持，讓認同西班牙國家文化的巴斯克人，可以轉而支持巴斯克獨立運動和說巴斯克語，相對地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因為上述原因較不採取暴力的恐怖行動。Laitin (1999) 透過脈絡化的因素來解釋和分析為何有些獨立運動的組織會採取暴力行動，而有些獨立運動的組織則較少採取暴力行動。另外，這樣的研究取向也是一種控制的比較，將個案限定在一個國家之內，分析不同分離運動組織如何與相同的國家中央進行互動，因而產生不同的策略和結果。

比較政治學者 Geddes (1994) 研究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家能力時發現，總統通常會面臨兩難的困境，一方面總統透過政治任命的職位可以鞏固短期利益，以便於在政治上可以存活，但長期來講因為政治任命的聯盟可能會管理不善，無法達成國家改革的目標；另一方面，如果追求長期的國家目標，可能會影響短期的政治存活；甚至當總統對於國會中較大政黨的恩寵資源分配不均時，改革較少發生，相反地，對於國會中較大政黨的恩寵資源分配較能利益均霑時，改革較容易進行。Geddes 的論點強調總統進行統治時的兩難困境，可能會讓其左支右絀，進退維谷。如何維繫政治存活和國家改革之間的平衡是總統施政最重要的課題。Geddes (1994) 透過巴西個案的具體經驗分析，延伸到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運作，以便驗證其論點的有效性和一般性。

上述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屬於比較歷史分析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的研究途徑。比較歷史研究途徑有三個特性：一、解釋和確認研究者所感興趣的結果之因果輪廓；二、清楚分析歷史的序列以及說明隨著時間改變過程中的發展；第三、系統化和脈絡化比較類似的個案以及對比的個案 (Mahoney and Rusechemeyer, 2003: 10-3)。比較歷史分析途徑相較於其他研究途徑的優點在於理論的形成和解釋總體層次上大規模和複雜之結果 (Thelen and Mahoney, 2015: 4)。政治學研究中的比較歷史分析途徑在三個層面上具有比較利益：第一、

比較歷史分析的總體輪廓取向可以連結到政治學的經典著作，持續關注大規模的政治和政治經濟的結果；第二、比較歷史分析集中在問題取向的個案基礎研究，其是廣泛性和回應性的議題設定之知識來源；第三、比較歷史分析注重歷史橫向的分析對於理解政治的過程和時間的發展是具有貢獻的。

政治學研究的途徑是多元取向的。政治研究者在選擇研究途徑之前，必須要能夠合理化為何採取特定的途徑。然而，研究途徑的選擇也可能是後設決定的。例如，提問何種研究問題決定了研究途徑的偏好和選擇。當政治研究者選擇研究大規模的政治現象，例如革命、政變、民主崩潰或資本主義的轉變時，其可能要透過比較歷史途徑來分析這些現象。因為這些現象可能是由多重的原因在一段長期間的互動過程後所產生的結果，無法透過縱斷面的事件來分析其因果機制。而所謂的比較可能是個案過程前後的比較或是不同國家相同現象的比較。所謂的歷史則是長時間的動態過程。換言之，比較歷史研究側重脈絡的考量，強調個案的背景條件和發展軌跡，企圖建立因果機制的解釋，而非挑選特定原因所產生的影響。

三、多重個案比較方法

多重個案比較方法是指兩個個案以上的比較方法。當研究分析所要解釋的個案不只有兩個，而是多個個案時，基本上可以採取兩種研究策略。一是對比式的因果關係比較：運用一致法找出多重個案的因果關係的共同性以及運用一致法在對比的多重個案中並沒有出現因果關係，再運用差異法進行兩組多重個案的比較來證成因果關係的效度。名義上對比式的因果關係比較兩個以上的多重個案，但是實際上是分成兩組個案，一組是有出現因果關係的個案，另外一組是對照組，有相似的條件，卻沒有出現因果關係的個案。換言之，將多重個案經由二元分組化之後，再進行結構式的比較解釋因果關係的脈絡。Moore（1993）的民主和獨裁的社會起源一書分析哪些因素會影響國家走上民主和獨裁的不同路徑。英國、法國和美國是由資產階級主導的革命，資產階級會藉由制衡獨裁者、支持正當、理性的統治者取代專制的統治者、參與規則的制定而漸進式地形成民主；德國和日本同樣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沒有出現大眾革命的巨變，反而是以由上而下的反動形式，促成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俄羅斯和中國經由農民革命最終形成共產主義的國家。Moore 的比較方法論是運用一致法來歸納三種不同的民主、獨裁或共產的路徑，同時運用差異法來凸顯這些不同路徑的發展結果。Moore 的研究途徑是強調階級對於革命的影響。資產階級是民主的發動機，如果沒有強的資產階級，很容易形成法西斯主義或是促成共產主義的崛起。Lubbert（1991）採取類似的階級分析，但進一步討論不同階級之間的結盟，其研究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二次大戰前的一些歐洲國家為何會出現自由民主國家、社會民主國家和法西斯主義。Lubbert 分析指出當中間和右派人士結盟一起對抗左派的勞工勢力，同時在政治上孤立勞工階級和勞工政黨，形成自由民主的政體；當都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農民結盟，組成工人階級政黨贏得政治權力，實施統合主義的利益代表，產生

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當自耕農和都市中產階級結盟一起，支持國家全面性指導工人組織的統合主義的安排，形成法西斯主義式的極權政體。Lubbert 的分析框架是不同階級之間的結盟如何形成不同類型的民主或威權政體。Lubbert 的自由民主國家是指英國、瑞士和法國，社會民主國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麥，法西斯主義國家是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Lubbert 以一致法找出特定類別國家之間的一致性，確認階級之間的結盟關係，運用差異法則比較三個類別之間國家特性的差異來解釋最後政體類型的不同。

Moore 和 Lubbert 的作品主要從階級或是階級結盟的角度來分析，這樣的途徑假定國家機器只是反映階級的利益（馬克思的分析途徑），其沒有自主性或是較少討論國家可能面臨的內、外在危機。比較政治學者 Skocpol（1979）的經典名著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選擇從國家危機的角度來分析社會革命，而不是依賴階級結構的詮釋。Skocpol（1979）所運用的比較方法是屬於對比式的因果關係比較，企圖解釋三個國家法國、俄羅斯和中國為何會發生社會革命，而另外三個國家英國、日本和德國有相同的條件，但卻沒有出現社會革命。法國、俄羅斯和中國面臨國際和國內情勢的交迫，出現嚴重的危機，造成國家控制能力的下降，同時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反叛，兩個因素結合起來相互增強之後導致社會革命的發生。Skocpol 運用 Mill 的同一法則和差異法則，法國、俄羅斯和中國都存在國家危機和農民反叛屬於同一法則的運用，而英國、日本和德國則是差異法則的運用，沒有出現國家危機和農民反叛，因此沒有發生社會革命（Mahoney, 1999：1158）。方法層次上，Skocpol 運用正反面個案的對照和比較的一致法和差異法，找出三個國家發生社會革命的原因。多重個案的比較方法如類型分析也可以一次處理四個類別的國家或個案。

（一）、類型分析（Typology）

政治學或社會科學的類型指涉的是所謂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德國社會科學家韋伯指出，理念類型的概念可以幫助研究上的歸納，理念類型不是假設，而是提供假設建構的指導，理念類型不是實體的描述，而是對於這種描述明白表達的方法（Weber, 1949: 90）。理念類型強調個別類別單方面的觀點以及綜合不同類別的現象結合成統合的分析建構；理念類型是心智的建構，無法在經驗世界中被發現（Weber, 1949: 90）。理念類型無法在經驗世界中被發現是指經驗世界出現的現象可能會與理念類型的特徵不同，經驗現象無法與理念類型的特徵完全吻合。科學哲學家 Carl Hempel 認為類型可以區分成三種：一、分類的類型（classificatory type）：不同的個案可以被分類到不同的類別；二、極端的類型（extreme type）：是指經驗個案中可能會與之近似的類型，稱之為極端類型；三、理念的類型（ideal type）：是指可以進行一般性假設驗證的理論系統。理念類型屬於解釋性的類型，因為其具有理論性的意涵。解釋類型在方法層次上會依據兩種不同的推論方式（Hempel, 1965）。一種是歸納過去既存的理論，這些理論是從經驗觀察得來，另外一種是演繹方式，因為每一個類型是理論變數互動所產生

的因果關係，這個部分需要理論的邏輯意涵 (Elman, 2005: 298)。解釋性類型還可以細分出不同的次類型。例如，階段性類型：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替代性類型：如兩種不同的類型可能會交互輪替的出現 (Nowotny, 1971: 25, 31)。

解釋性類型在政治學研究中，普遍地被運用在分析政治現象之上。Nichter (2008:20) 以選舉動員中被收買的投票傾向和被收買者的政黨偏好兩個變數來建構四個不同的動員模式，請參閱表一。當被收買者傾向投票以及被收買者的政黨偏好是支持政黨的時候，屬於獎勵忠誠者模式，這種模式不需要進行投票選擇的監控；當被收買者的投票傾向是針對冷漠或反對政黨的選民時，是屬於買票模式，買票模式需要監控投票選擇，以確保買票的成效；當被收買者傾向不投票以及被收買者的政黨偏好是支持政黨時，則政黨會進行投票收買，動員這些人出來投票，此時需要監控投票率的高低；當被收買者傾向不投票以及被收買者的政黨偏好是冷漠或反對政黨時，此時政黨會執行雙重說服的動員，這種動員需要同時監控投票選擇和監控投票的高低。Nichter (2008) 的兩個解釋變數是類別式的變數，以投票傾向與否和政黨支持與否建構出四種不同動員的模式。Nichter 的問題意識在於強調政黨除了收買反對者以外，政黨也會對於自己的支持者進行獎勵，經由誘因的提供來動員和強化原本的支持者。

表一：選舉動員的獎勵對象

		被收買者的政黨偏好	
		支持政黨的	冷漠或反對政黨
被收買者的投票傾向	傾向投票	獎勵忠誠者 (不需要監控投票選擇)	買票 (需要監控投票選擇)
	傾向不投票	投票收買 (需要監控投票率高低)	雙重說服 (需要監控投票選擇和投票高低)

資料來源：Nichter (2008: 20)。

Share (1987) 以類型建構的方式來解釋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的幾種模式。影響威權轉型到民主有兩個變數：一是民主化的速度，二是政權領導者支持或政權領導者反對民主。民主化的速度是雙元變數，分成漸進式民主和快速民主。政權領導者這個變數也是雙元變數，區分成支持民主和反對民主。兩個雙元變數互動之後產生四種結果。第一、漸進民主化；第二、長期革命的鬥爭；第三、協商式民主轉型；第四、斷裂式民主轉型 (例如革命、政變、崩潰和分離)，請參閱表二 (Share, 1987: 530)。有關民主化速度的變數測量是次序尺度 (ordinal scale) 的測量，有關政權領導者支持或反對民主是類別尺度 (nominal scale) 的測量。

類型建構上，這是屬於解釋型的類型（explanatory typology），表格中的列和欄是被解釋變數，兩個解釋變數互動產生的假設性的結果（Collier, Laporte and Seawright, 2008: 153）。四種不同類型代表不同的民主化的模式和發展。以台灣為例，台灣屬於民主化速度是快速的模式以及政黨領導者支持（共識型模式）。台灣的民主發展基本上是由反對運動對於威權體制的挑戰，而威權領袖開放黨禁、報禁和舉行國會選舉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開展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的道路。屬於協商式民主的模式。協商式民主的優點是沒有發生激烈的革命衝突，但由於其是漸進式的改革會使得民主鞏固的過程中充滿著不確定性。

表二：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的類型

		政權領導者支持或反對民主	
		支持民主 （共識型）	反對民主 （非共識型）
民主化速度	漸進	漸進民主化	長期革命的鬥爭
	快速	協商式民主轉型	斷裂式民主轉型 ：如革命、政變、 崩潰、分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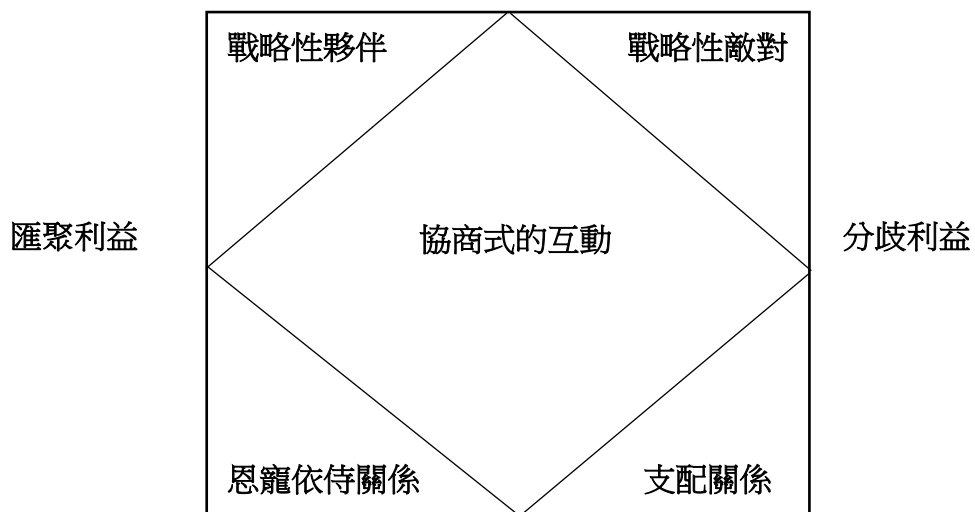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Share（1987: 530）。

類型建構中，每個結果方格是全面性概念的一種類別，每行和每列的變數提供每個方格類型中的核心界定特徵（Collier, Laporte and Seawright, 2012: 222）。透過類型建構和模式的說明可以達成類型建構的兩個目標：完全耗盡和相互排除。例如假如有 N 個人必須被分類到不同的班級，每一個人會有一個合適的班級（完全耗盡）以及沒有一個人屬於兩個班級（相互排除）（Bailey, 1994:3）。首先，所謂的完全耗盡不是指窮盡所有的可能類型，基本上這些類型是根據變數交互影響而來，因此其只是在特定範圍下的個案類型。其次，相互排除基本上是指每個類型的特徵是不同的，在分析上可以獨立成為一個類別。然而，在經驗現象上，可能會出現特定個案或國家包含兩種以上的類型或是位於不同類型之間的邊界上。例如，有些國家不是轉型到民主或威權，而是進入民主和威權之間的灰色地帶（Carothers, 2002）。跨類型的個案也可以被界定成另一種類別，例如具有選舉的威權國家被稱之為競爭性威權主義（Levitsky and Way, 2010）。

除了比較政治領域中會運用到類型建構來進行解釋之外，政治學中國際關係領域也會運用類型建構來進行分析。不對稱的國際關係理論，運用雙變數的特徵

來建構大小國的互動模式，請參閱圖一。當大小國之間的利益是匯聚利益且兩個國家對於雙邊關係都是同等的關注時，則兩個關係是戰略性夥伴關係；反之，當大小國之間的利益是分歧利益且兩個國家對於雙邊關係都是同等的關注時，則兩個國家是戰略性敵對關係；當兩個國家之間的利益是匯聚利益，而只存在著大國對於小國的單邊關注時，則為恩寵依恃關係；當兩個國家之間的利益是分歧利益，而只存在著大國對於小國的單邊關注時，則兩個國家為支配關係；表中的中間方格是協商式的互動（Womack, 2016:53）。大小國不對稱互動的類型解釋屬於描述性的類型，主要是藉由匯聚、分歧利益和關注程度的雙元變數進行結合之後，形成四種不同的不對稱關係模式（Collier, Laporte and Seawright, 2008: 153）。這樣的分析框架可以釐清大小國家之間可能的對應模式以及兩者之間在甚麼情況下會出現協商式的互動，甚麼情況下會出現衝突式的敵對。

同等的關注



單邊的關注

圖一：不對稱互動的領域

資料來源：Womack (2016:53)。

(二)、組合排序

多重比較方法除了類型建構的方法之外，還有一種所謂的組合排序的方法。政治學者吳玉山運用三個變數組合解釋半總統制國家的政治穩定，總共有八種模式，請參閱表三（Wu, 2000）。一、當府會一致、總統權力小、兩黨體系，最為穩定，例如法國第五共和的非共治時期；二、當府會一致、總統權力小、多黨體系，是次穩定，例如波蘭的非共治時期；三、當府會一致、總統權力大、兩黨體系，是第三穩定，例如中華民國從 1997 年 7 月到 2000 年 5 月；四、當府會一致、總統權力大、多黨體制，是第四穩定，目前尚未有案例可以適用；五、當府會不一致、總統權力小、兩黨體系，是第五穩定，例如法國第五共和(共治時期)；

六、當府會不一致、總統權力大、多黨體系，是第六穩定，例如波蘭的共治時期；七、當府會不一致、總統權力大、兩黨體系，是第七穩定，例如中華民國自 2000 年以後；八、當府會不一致、總統權力大、多黨體系，是屬於最不穩定的模式，例如威瑪共和、俄羅斯。組合排序的多重比較方法基本上是運用三個雙元變數，形成八種模式。這八種模式所產生的依變數是次序變數，從最穩定到最不穩定。府會一致對於政治穩定的影響是正向，而府會不一致對於政治穩定的影響則是反向。總統權力小較容易產生政治穩定，相對地總統權力越大，越容易產生政治不穩定。兩黨體系較容易產生政治穩定，而多黨體系較容易產生政治不穩定。相較於多黨體系較容易產生政治穩定。這種組合排序的多重比較方法可以包含多個類型的國家。同時，這種方式也是特徵連結的動態分析，讓相同類型的國家可以進行差異性的比較。組合排序的自變數不限於三個，也可以運用四個或以上的自變數來解釋依變數的結果。

表三、政治制度與穩定之關係

府會一致	總統權力	政黨體系	政治穩定	經驗個案
一致	小	兩黨	1	法國第五共和（非共治）
一致	小	多黨	2	波蘭（非共治）
一致	大	兩黨	3	中華民國（1997/7-2000/5）
一致	大	多黨	4	沒有相關案例
不一致	小	兩黨	5	法國第五共和（共治）
不一致	小	多黨	6	波蘭（共治）
不一致	大	兩黨	7	中華民國（2000 年以後）
不一致	大	多黨	8	威瑪共和、俄羅斯

資料來源：Wu（2000: 13）。

（三）多重比較方法的效用

多重比較方法可以針對一般性的假設進行測試，看一個特定的關係是不是可以在多個個案中成立，避免從單一個案所形成的一般化謬誤，這種謬誤是錯誤的普遍主義，認為在單一個案所設計和測試的理論也一樣可以適用到其他的個案上（Rose, 1991: 453-454）。首先，多重比較方法可以確認和檢證單一個案研究所得出理論的適用性範圍。多重比較方法可以藉由觀察密切吻合的多重個案的變化，而不是單一個案的個別結果來形成研究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Slater and Ziblatt, 2013: 1307）。多重個案的外在效度必須建立多重母體的概念之上。例如，大國所發生的革命和被殖民國家的革命之性質不同。適用大國革命的因果關係不

必然可以延伸到被殖民國家的革命。這兩種革命類型的母體是不同的或是有一些異質性，不能合併在一起來分析相同的因果關係。另外，因果路徑或是原因出現的順序不同，不可以等價式或是認為具有共量性的普遍適用標準來進行套用。政治學部分的研究議題之所以適合多重比較方法的原因在於個案數目的限制。因為國家或是政治組織的個案數並不多，有些研究主題無法進行大樣本的統計分析。換言之，這些研究只能透過多重個案的比較分析來進行相關的研究。其次，部分政治學研究的主題內容可能涉及複雜性事件，例如革命、威權政體轉型或鞏固、民主崩潰或鞏固。這些複雜性事件可能較無法用數字或是值來呈現，因此透過多重個案的比較方法來掌握事件或結果的來龍去脈相對較能夠切中主題，解釋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再者，多重比較方法可以排除個案中特殊或獨特原因。雖然單一個案的研究過程中，較能區辨出哪些原因是必要或是充分原因，但是唯有透過多重比較方法才能確認解釋原因的屬性（Ragin, 1987）。因為特定原因在某個國家之中是必要原因，但是在其他國家中可能是充分原因。多重個案的多重原因性的組合較能夠全觀式（holistic）地掌握因果關係的多重路徑。最後，多重個案的分析可以建立區塊，經由其他多重個案的研究來形成面向式的研究。這樣的分析方法可以控制個案間異質性的延伸，讓個案的差異性特徵凸顯出來，同時也因為多重個案的方法得出相對較為一般化的研究結果。

（四）、個案選擇標準的論辯

運用比較歷史分析途徑的經典研究是比較政治學者 Theda Skocpol 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Skocpol, 1979）。Skocpol 運用 Mill 比較方法的一致法和差異法來進行比較，一致法的運用是找出同樣發生社會革命的法國、俄羅斯和中國相同的因果關係，差異法的運用是對照同樣條件卻沒有發生革命的英國、日本和德國，以及比較解釋俄羅斯 1905 年革命失敗和 1917 年革命成功的控制條件比較（Skocpol, 1979:36-37）。法國、俄羅斯和中國都存在國家危機和農民反叛的因素，最終發生社會革命，而英國、日本和德國沒有出現國家危機和農民反叛，因此並沒有發生社會革命（Skocpol, 1979）。社會學者 Nichols（1986:173）評論 Skocpol 的作品指出，Skocpol 錯誤運用了 Mill 的法則，因為 Skocpol 結合了雙變數來解釋成功的社會革命，而 Mill 法則只強調單一原因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組合變數的解釋。Skocpol（1986: 188-189）答辯指出，雙變數的結合是社會科學解釋的常態，如同統計研究中的互動變數，而 Mill 法則協助她在一些少數的個案中搜尋到解釋的原因。比較歷史分析除了總體因果關係的分析之外，還可以運用兩種其他的方法。一、運用歷史的個案來並列說明假設和理論的效用性；二、脈絡的對比，強調個案之間的差異具有脈絡的特殊性（Skocpol and Somer, 1980: 176-181）。針對 Skocpol 一致法的個案選擇，政治學方法論學者 Barbara Geddes 認為可能會出現選擇性的偏差。因為選擇特定的依變數結果如成功的革命，基本上自變數和依變數的因果關係只存在研究分析的多重個案中，但是其他類似的個案可能只存在自變數的原因，但卻沒有出現依變數的結果，因此原本的自變數和

依變數的關係可能是虛假關係或是只存在少數的個案中，無法進行更廣泛的一般化推論（Geddes, 1990: 132-134）。類似的批評是少數個案研究的決定性（deterministic）因果關係，對於機率式（probabilistic）的理論評估會出現困難以及少數個案對於一般化的推論來說，並不是一個適當的基礎，因為少數個案的結論很可能在全面個案的評估中被推翻或是只研究少數的個案，並沒有聚集足夠的個案來測試理論中所有邏輯的可能性（Liebersohn, 1991: 310-311）。另外，個案與個案之間的可比性，也是比較歷史分析可能會出現的難題。不同歷史個案的等同性（equivalence）和獨立性（independence）會出現互斥現象，確保等同性會減少獨立性，確保獨立性會減少等同性，因為不同的個案是處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脈絡，差異性極大（Sewell, 1996: 259-260）。針對這些批評，質化方法論學者 James Mahoney 提到 Skocopl 的研究有清楚的控制比較，因為她運用一致法的原則發現國家組織的面臨崩潰和政治社會結構有利於農民的反叛兩項因素同時存在法國、俄羅斯和中國，另外用差異法排除相對剝奪感和都市工人的反叛，以證成國家組織的崩潰和農民反叛兩項因素的解釋性（Mahoney, 1999: 1157-1160）。另外，質化方法的分析，通常會形成決定性的因果關係，而不是機率性的因果關係，主要是因為因果關係是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另外，質化方法針對少數個案的結論並沒有理論上全面一般化的企圖。例如針對大國所發生的社會革命所得到因果關係解釋，並沒有要推論到所有發生社會革命的個案之上。用全部母體其他個案的因果關係來駁斥少數個案的因果關係，會出現雞兔同籠方法論矛盾問題，兩者的脈絡不同，不能用一般化的抽象層次來套用在多重差異個案的解釋。

（四）、多重個案選擇的標準和運用

多重個案選擇可以根據以下幾個標準來選擇研究的對象或單位。一、先演繹後歸納。選擇個案的標準應該先經由演繹的方式進行理論性的推演。當然，研究分析不可能是純粹演繹的方式，解釋原因可能是從個案的經驗現象得出，然而因果關係的連結通常是由演繹的思考方式得出，經由個案資料來證成分析的效度。所謂の後歸納是指研究個案的特徵必須符合特定的先決條件。換言之，必須要先確認這些個案的類別屬性，如果不屬於相同或類似的類別的話，很容易產生無法個案特徵異質性的問題。先演繹後歸納的優點是避免讓經驗資料侷限理論框架或是運用理論來篩選經驗資料。二、具有可比較性。個案之所以能夠進行比較，必須依循一致法、差異法或是脈絡化比較方法。這樣的比較才會有方法論上的效用。沒有依循這些方法的比較，不能稱之為比較，只能稱之為羅列。例如台灣、英國、日本、美國官僚制度的比較。這樣的比較會產生將可比較或不可比較的個案通通放在一起的矛盾問題，亦即將不同的個案特徵放在一起，看似有比較，但實際上，只是將相同類別的特徵製表放在一起。以比喻的方式來說，看似好像比較蘋果和蘋果，實際上反而是蘋果和香蕉的比較。三、因果同質性的標準。選擇具有因果同質性的個案，個案中相同的原因經由相同的因果機制連結或產生相同的結果（Beach and Pederson, 2016: 10）。四、相同的脈絡。這些個案在分析上、時間上、

空間上或制度上的場域之相關面向是相同的 (Falleti and Lynch, 2009: 1152)。四、比較正面個案和反面個案。比較出現因果關係的個案和有出現相同原因卻沒有出現同樣結果的反面個案。(Mahoney and Goertz, 2004)。五、否證性。多重個案的理論或分析架構除了解釋可能的因果關係之外，其也可以否證其他的替代性解釋 (Popper, 1983: xxii)。換言之，藉由指出替代性解釋的不足之處，可以證成自身解釋的理性基礎以及強化解釋的效度。六、經驗資料的對稱性。多重個案的因果關係和分析框架必須經由經驗資料來證明，因此各個個案的經驗資料必須具有對稱性或是直接性，否則就會出現證明的缺漏和不完整性。當然，對於每個個案的資料分析不必然是第一手詮釋，亦即使用該個案或國家的本土語言。如果使用可信度高的二手語言報導或是專家分析，基本上還是具有對稱性。

多重個案選擇可以運用幾種不同的策略：一、比較最相似的個案，如選擇同類相似、同一時間內的多重個案、同一地區的多重個案；二、比較最不相似的個案：自變數和依變數的變異性大的個案、類型不同的個案、反事實推論的分析；三、重要的個案：歷史上著名的個案、原型的個案；四、實用取向的個案選擇：選擇較少被研究個案、具新穎性的個案；五、界定定義或概念界定的個案、六、獨立性個案；七、重製性個案 (Beck, 2017: 538-540)。另外，選擇個案的技巧也可以根據以下九個標準：一、典型個案：具有一般化的特性，兩個或以上的個案都呈現因果關係；二、多樣性個案：自變數和依變數呈現多重變化；三、極端個案：自變數和依變數皆呈現出極端值；四、異例：與一般性個案差異很大，屬於理論外圍的個案；五、影響性個案：個案自變數的輪廓特徵具有影響力；六、重要性個案：最可能出現或最不可能出現特定結果的個案；七、路徑方向：個案的自變數可能造成正向結果的路徑；八、最相似個案：個案間的條件幾乎相同，但因果關係不同；九、最相異個案：個案條件相異，因果關係相似 (Gerring, 2007: 89-90)。簡言之，多重個案的選擇仍有一定科學標準，並不是隨意組合或是故事敘述的鬆散研究。

參、結論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評析不同的比較方法和其效用。比較方法基本上可以分成控制比較方法、脈絡化比較方法、多重個案比較方法。控制比較方法基本上是藉由個案之間的類似和差異的控制來搜尋因果之間的關係和連結。脈絡化比較則是處理運用控制比較方法卻無法比較的個案，透過脈絡的抽象化來進行比較。多重個案比較方法是比較兩個以上的個案，透過類型建構或組合排序來進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必須關注和比較不同的國家的發展。當然，有些國家之間並不具有可比較性，所以很難成為研究的對象。研究最重要的目標是找出比較的基礎。比較並不是所謂的羅列或是製表。例如研究常常以台灣、日本、英國、德國和美國國家官僚體系的特性進行所謂的「比較」，羅列出這些國家的官僚特性或運作基礎，並製成表格來說明。從比較方法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研究完全沒有比較，其只是針對不同的國家將相關的官僚體系的特徵整理呈現出來。這樣的研究並沒有透過

比較基礎來說明為何要比較這些國家。事實上這些國家可能充滿異質性，無法全部放在一起衡量。另外，比較研究的意義在於透過比較來衡量個別國家的發展。如果沒有比較，研究者很難知道為何特定的條件是事件發生的獨特原因或是一般原因。每個個案都可能有一些獨特性，但是唯有透過比較才知道那些個案可以被放在同一個比較基礎或是比較類別之上。政治學研究的課題之一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或是國家內部的發展，這樣的研究特性基本上只有透過比較才能理解不同國家為何有相同的模式或是相同的國家卻出現不同的模式。比較研究可能會產生的相關偏誤是研究者選擇用發展理論的國家所使用的概念來套用到其他的國家的經驗，而忽略其他國家可能存在的差異性。例如，政治學的系統論和結構功能論是從依據美國的政治結構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如果將這些概念全部套用在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會出現所謂的脈絡不同或是雞兔同籠的問題。美國以外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政治運作模式或是發展過程，直接適用系統論和結構功能論的觀點，無法真正解釋這些國家的政治現象。另外，許多國家移植美國總統制的精神，但運作起來卻可能有不同的結果。研究者不能假定只要是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其命運和結果是相同的。因為特定的憲政制度必須和其他的政治制度的配套一起來衡量可能產生的差異和結果，而不是想當然地認為相同的制度會產生相同的運作模式。

本文所側重的重點是回顧和討論比較方法的類型和運用。比較方法可以細分成一致法、差異法、脈絡化比較方法、多重比較方法。一致法是比较兩個個案特徵極為不同，卻有相同的因果關係。差異法是比较兩個個案特徵極為相似，但是兩個個案之間有不同的因果關係的差異或是程度差別。脈絡化比較方法所比較的不是蘋果和蘋果的比較，而是蘋果和橘子的比較。蘋果和橘子的比較雖然是不同的個案，但是透過分析層次的提昇來進行所謂的脈絡化比較。多重個案的比較方法主要是解釋分析兩個以上的個案，透過對比、類型建構的方式來進行比較。多重個案的選擇標準為一、先演繹後歸納；二、具有可比較性；三、因果同質性；四、比較正面和反面的個案；五、否證性；六、資料的對稱性。這些個案選擇的標準可以增加多重個案比較方法的內在效度和外在效度。政治學研究的知識社會學屬於多元主義，非定於一尊。多元主義的基礎必須建立在根據不同的研究問題和個案來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 何明修，2003，〈自主與依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台灣社會學刊》，30：1-32。Ho, Ming-sho. 2003. [Autonomy and Dependency: Kongliao Anti-nuclear Movement and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to Construct Two Ideal Types in Political Exchange].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1-49.
- 吳玉山，2002，〈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2：229-265。Wu, Yu-shan, 2002. [Cabinet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Comparing Russia, Poland and the ROC]. *Journal of Russia Studies* 2: 229-265.
- 林正義，2007，〈「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臺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基金會季刊》，81(1)：1-51。Lin, Cheng-yi. 2007. [Strategic Ambiguity, Strategic Clarity, or Dual Clarity: U.S. Policy Debate over the Prevention of A Taiwan Strait Crisis]. *Prospect Quarterly* 8(1): 1-51.
- 湯京平、呂嘉泓，2002，〈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從山美與里佳經驗談社區自治與「共享性資源」的管理〉，《人文及社會集刊》，14(2)：261-287。Tang, Ching-ping and Chia-hung, Lu. 2002.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elf-Governance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aiwan'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14(2): 261-287.

二、西文部分

- Bailey, Kenneth D. 1994. *Typologies and Taxonom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each, Derek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 2016. "Selecting Appropriate Cases When Tracing Causal Mechanism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January 13, 2016, DOI: <https://doi.org/10.1177/0049124115622510>.
- Beck, Colin J. 201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Practi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1(3): 533-554.
- Brady, Henry E., and David Collier, 2010.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Caporaso, James. 2000. "Comparative Politics, Diversity and Coher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699-702.
-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 5-21.
- Collier, David and James Mahoney. 1996. "Insights and Pitfalls: Selection Bi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49(1): 56-91.
- Collier, David, Henry E. Brady, and Jason Seawright, 2006. "Toward a Pluralistic Vision of Methodology." *Political Analysis* 14(3): 353-68.
- Collier, David, Jody Laporte and Jason Seawright. 2008. "Typologies: Forming Concepts and Creating Categorical Variables." in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and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52-73.
- Collier, David, Jody Laporte and Jason Seawright. 2012. "Putting Typologies to Work: Concept Formation, Measurement, and Analytic Rigor."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5(1): 217-232.
- Collier, Ruth Berins and David Collier. 2002.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DeFelice, E. Gene. 1980. "Comparison Misconceived: Common Nonsens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3(1): 119-126.
- DeFelice, E. Gene. 1986. "Causal Inference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3): 415-437.
- Duverger, Maurice. 1969.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Lowe and Brydone.
- Elman, Colin. 2005. "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 293-326.
- Falleti, Tulia G. and Julia F. Lynch. 2009. "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9):1143-1166.
- Farber, Henry S. and Joanne Gowa. 1995. "Politics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 123-146.
- Faure, Andrew Murray. 1994.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6(3): 307-322.
- Frendreis, John P. 1983.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and Detection of Covariation: The Purpose and Logic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6(2): 255-272.
- Geddes, Barbara. 1990.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2 (1): 131-50.
- Geddes, Barbara. 2003.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erring, John. 2007.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mpel, Carl G. 1965. "Typological Methods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arl G. Hempel, ed.,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155-171.
- Hopkin, Jonathan. 2010.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r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p. 285-307.
- King, Gary,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itin, David D. 2002.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tate of the Subdiscipline."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p. 630-659.
- Laitin, David D. 1999. "National Revivals and Violence." in John R. Bowen and Roger Petersen, eds., *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1-60.
- Lees, Charles. 2006. "We Are All Comparativists Now: Why and How Single-Country Scholarship Must Adapt and Incorporate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9): 1084-1108.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son, Stanley. 1991. "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cial Forces* 70 (2): 307-20.
- Lijphart, Arend.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3): 682-693.
- Lim, Timothy C. 2006. *Do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Publishers.
- Lim, Timothy C. 2016. *Do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3rd Editio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Locke, Richard and Kathleen, Thelen. 1995. "Apples and Oranges Revisite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 an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abor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23(3): 337-67.
- Locke, Richard and Kathleen, Thelen. 1998. "Problems of Equival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les and Oranges, Again." *APSA-CP Newsletter of the APSA Organized Sec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9(1): 9-12.
- Luebbert, Gregory M. 1991.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Social Classe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honey, James and Gary Goertz. 2004.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4): 653-669.
- Mahoney, James. 1999. "Nominal, Ordinal, and Narrative Appraisal in Macrocaus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4): 1154-96.
- Mahoney, James. 2007.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2): 122-44.
- Mahoney, Jame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40.
- Meckstroth, Theodore W. 1975. "Most Different Systems" and "Most Similar Systems": A Study in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Inqui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8(2): 132-53.
- Mill, John Stuart. 1843/2000.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London: Routledge.
- Moore, Barrington. 199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Nichter, Simeon. 2008. "Vote Buying or Turnout Buying: Machine Politics and the Secret Ballo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2(1): 19-31.
- Nichols, Elizabeth. 1986. "Skocpol o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vs. Historical Conjuncture."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9: 163-186.
- Nowotny, Helga. 1971. "The Uses of Typological Procedures in Qualitative Macrosociological Studies." *Quality and Quantity* 6(1): 3-37.
- Peters, B Guy. 1998.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and Method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Paul. 2003. "Big, Slow-Moving, and ... Invisible: Macrosocial Processes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7-207.
- Popper, Karl. 1983. *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Press.
- Ragin, Charles.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se, Richard. 1991. "Comparing Form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39(3): 446-462.

- Sartori, Giovanni. 1991.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3(3): 243-57.
- Sartori, Giovanni. 1994. "Compare Why and How: Comparing, Miscomparing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Mattei Dogan and Ali Kazancigil, eds., *Comparing Nations: Concept, Strategies, Substanc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14-34.
- Savolainen, Jukka. 1994. "The Rationality of Drawing Big Conclusions Based on Small Samples: In Defense of Mill's Methods." *Social Force* 72(4): 1217-1224.
- Share, Donald. 1987.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4): 525-48.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6. "Analyzing Causal Configurations in History: A Rejoinder to Nichol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9: 187-194.
- Skocpol, Theda, and Margaret Somers. 1980.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 (2): 174-97.
- Slater, Dan and Ziblatt, Daniel. 2013. "The 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1): 1301-1311.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45-280.
- Tarrow, Sidney. 2010. "The Strategy of Paired Comparison: Toward a Theory of Practi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2): 230-59.
- Thelen, Kathleen and James Mahoney. 2015.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49. *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omack, Brantly. 2016.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Yu-shan. 2000. "The ROC's Semi-presidentialism at Work: Unstable Compromise, Not Cohabitation." *Issues and Studies* 36(5): 1-40.
- Yashar, Deborah J. 1997. *Demanding Democracy: Reform and Reaction in Costa Rica and Guatemala, 1870s-195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Types and Applications of Comparative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arse out the methods of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 and multiple case comparison.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comparison is to probe the causality and its connection by controlling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cases.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 is to take stock of incomparable cases by selecting analytically parallel phenomena for comparison. Multiple case comparison entertains comparing two cases or more by employing typological analysis and sequential combin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andard of selecting multiple cases is first deduction and then induction, comparability, causal homogeneity, compar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ses, falsification, and the symmetry of empirical data.

Keywords: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 multiple case comparison, typ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sequential combination